

原道

第十五辑

主编 陈明 朱汉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原道

第十五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道 第十五辑/陈明,朱汉民主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1119-489-0

I. 原… II. ①陈… ②朱… III. 文史哲—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144 号

YUAN DAO

原道(第十五辑)

陈 明 朱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 杨林玉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热点与对话

儒学第三期三十年座谈	(3)
关于汶川抗震救灾的思考 中国需要儒教	
——汶川大地震的启示	蒋 庆 (74)
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	赵汀阳 (78)
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	陈 明 (82)

思想与学术

论自由主义的保守化	姚中秋 (89)
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试说	陈 明 (142)
关于汶川抗震救灾的思考	陈家琪 (151)
如何把韦伯切成两半	
——新儒家与“继发型资本主义”的伦理价值	赵毅衡 (156)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管窥	袁德良 (173)
南辕北辙的现代古典学	
——以“中国哲学”为例	邓曦泽 (196)
殷周之变中的宗教观念革命：天人关系之争	邹晓东 (209)
从“觉知”看阳明心学的内观工夫	徐湘霖 (224)

古典新诠

程颐对《论语》8.9 及 17.3 的哲学解释	黄勇 (美国) (239)
从“吾与点也”到“颜渊问仁”	
——《论语·先进》“侍坐”章小议	任 鹏 (265)

以道观之：“自然”的双重维度

——对《老子》“自然”观念的再思考 张理峰 (280)

天下儒学

无相大光明论（上篇：道论） 余棹法 (289)

读书与评论

贝淡宁著《中国新儒家》简评 迈克尔·莱文森 著 吴万伟 译 (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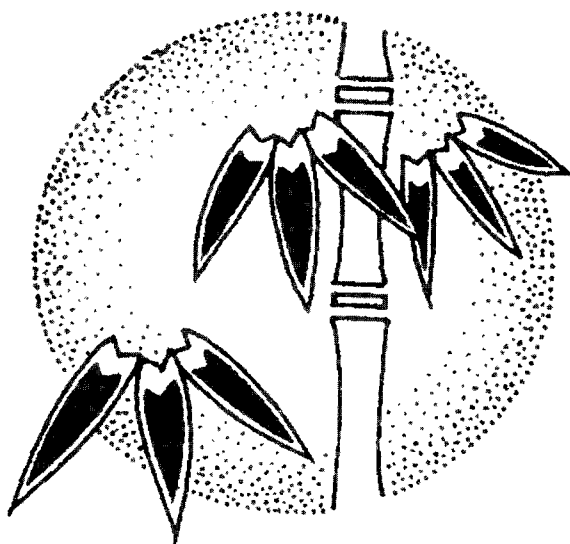
李泽厚的“吃饭哲学”读后 谢文郁 (305)

在“个体命运”与“人性情感”之间

——李泽厚三种近著读后 肖自强 (308)

编后 (310)

热点与对话



儒学第三期三十年座谈

黄万盛（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学社杜维明教授觉得，儒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研究工作有了根本性转变，现在中国经济也崛起，世界全球化进程也出现一些新的倾向，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怎么来总结一下儒家当代研究已经做的工作，同时能够协调一下看看今后有什么样的课题呢？主要想围绕这个题目，大家能够交流一下意见，彼此增加一些了解。不期望形成一个共同意见，完全就是交换一下彼此之间的认识。

大概三十年以前吧，一方面杜维明回国讲学提到新儒家的发展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国内本身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有很多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反思。我记得当时有庞朴先生写的《中庸平议》，把儒家“中庸”的问题再提出来。李泽厚先生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东西，叫《孔子再评价》，让大家直面孔孟之道的的问题。因为从五四再到一九四九一直到“文革”，孔孟之道一直是个批判的对象。大概从你那个《孔子再评价》出来的时候，是从批判的对象转变为研究的对象和学习的对象。

（李泽厚：那个文章本来是第一期刊出的，在一个专家讨论会上被否決掉了。第二期才登出来。当时那些专家都是我上一辈的，但是那个时候没通过，差一点就枪毙了。所以国内年轻人不要怕枪毙，我这个第一次枪毙了第二次还是站住了。）以后就是个人的研究，协调国内的学术力量，有计划

地开展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研究工作。朱维铮先生和庞朴先生在上海合作出版文化史的丛书，对整个中国文化回到我们学术研究的视野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王元化先生和我合作在上海搞了一个比较文化的研究中心；然后汤一介先生很快就在北大搞出这个中国文化书院。以后我们又大概有两次会，一次是在深圳开文化的协调会议，当时 Fred Wickman 这些人都参加了；后来一次在杭州……转眼之间就是二十几年三十年的事情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很多当时没有参加的新人现在全部出来了，已经成为现在国内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了。所以我想这个丰富而比较长的时段我们有一些可以回顾和总结的东西。我想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来谈一谈，过去这些年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收获，尤其看一看整个的儒家研究当中基本的困难、最主要的学术课题，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进一步发掘的。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来就是非常的有机也比较紧密，现在在这个向度上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跟中国的转型相关的，像蒋庆提出的“政治儒学”这个问题，跟日常生活的整个精神性有很大的缺失这么一个现象。像于丹这些学者也开始在讲孔子、儒家，我觉得都是一些新的现象，过去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考虑的范围。咱们这每一个参加的人可短可长，最多不要超过 10 分钟，谈一下对刚才讲的这些方面的看法。然后我们在大家谈的基础上可以把一些要点集中起来，形成一些问题意识，在这个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

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先讲两句吧。我们已经知道李先生和朱先生对所谓“当代新儒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对儒学的当代发展、对“新儒家”的概念也有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说理解。这些想法是和杜先生所提倡的新儒学的观念和儒学第三期发展是相当的不同。我想这个恰恰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会应该不是只有一条线索，就是杜先生的那条线索，就是按照杜先生对新儒家的理解，或者说对当代新儒家的理解，或者说对儒学第三期的理解，顺着这个理解来讲。恰恰是要，用杜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吧，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论域。大家共同来讨论儒学当今的意义和它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李先生自己也讲过他自己是新儒家。（李泽厚：我是新儒家，这是别人说的，我没有否认。也有说我是新马克思主义，我也没有否认。）没有否认就是默认了，是吧。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就拿杜先生来我们这的一个经验吧。他是 78 年

来的，来了一个月。80年又来了一年差不多。然后83年又来了一下子，那是来参加汤用彤的那个会，当时李先生也在，后来有《燕园论学集》发布。然后就是85年了，85、86、87年就来的比较频繁了。89以后到94、95年有一个间隙。我第一次见他是在80年北京市哲学会，是他做报告。一直到85年，其实这一段他没讲什么新儒家，没讲牟宗三、也没讲唐君毅。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新儒学、港台新儒学的那一套东西并没有讲。80年来他讲的是《道学政》，后来在《中国哲学》里发表的《道学政》。（李泽厚：他是讲道统、学统、政统。我是不同意的。）那时候没讲牟宗三什么的。同时在人大还是在哪儿给了一个讲演《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这个当时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各发了一篇。那个时候他基本是在中国哲学的圈子里面讲的这个，而且没有讲新儒学。所谓新儒学，我的理解就是从熊十力到牟宗三所谓新心学的这一套体系。到了83年来，他给的论文是讲体知，收入《燕园论学集》里。（李泽厚：是讲“圣人体无”。）直到他85年来，那时候我给他做助教，那个时候他讲的是“儒家哲学”，在北大开的课。85年开始就有文化热了，这个时候他主要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如果说他前两次来是讨论中国哲学，那么他这一次来就是讲的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也没有集中讨论所谓新儒学的问题。比如牟宗三的哲学思想、那些哲学观点，那些都没怎么讲。所以我想，如果你讲当代新儒家，也就是港台的当代新儒家，这个研究跟杜先生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要澄清一下。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了杜先生来传播了新儒家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开始研究这些港台新儒家。（牟钟鉴：“第三期”是什么时候开始提的？）“第三期”是85年开始讲了，这个“第三期”发展是和文化讨论有关系。（李泽厚：“第三期”是牟宗三先生提出来的。）他在85年讲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热，儒学第三期就是作为儒学仍有当代意义，仍然可以进行现代转化，如果没有现代转化、没有现代意义就没有第三期了。所以更多介入的是文化。这个文化的讨论我觉得他的功劳是不小的。功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整个80年代以来，庞公70年代末也写了孔子的文章，李先生70年代末也写了孔子的文章，但是发表都是在80年代。但是在这个过去以后，特别是到了82、83年以后，由于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思潮的变化，基本上来讲有点像五四那个时代思潮的动向，就是对传统进行批评批判。我那个时

候思想也是这样。那是现代化动员的时代，大家有启蒙的意识在里面。

李泽厚：当时反传统是主流，出现了“四大名将”。其中一个就是包遵信先生，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虽然他的观点我不同意。另外三位一个是金观涛先生；一个是刘晓波，他的文章当时是影响很大的，那时他的文章是洛阳纸贵，而且是一直针对鄙人的；第四个现在还是鼎鼎有名的，刘小枫先生，他的《拯救与逍遥》从孔子、屈原一直批判到鲁迅。当然刘晓波的学术功底算不上，其他三个还是有学术基础的。你讲新儒家的发展必须把这个背景补上去。

陈来：这四个人里面我觉得包遵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李泽厚：他是从思想史上讲。）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动员的时代，接到五四，他的发展路径是最有代表性的。小枫他是从宗教、人生这些角度，他提的问题更深一点。但就整个能够代表那个时候的思潮，应该是包遵信讲的这一套。（李泽厚：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二刘”。）因为老包是集中在儒学与现代化这个问题上。

李泽厚：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就是刘小枫和刘晓波。（牟钟鉴：《河殇》是在什么时候？）《河殇》是在87年。

陈来：我想杜先生确实有功绩。如果再按照那个思潮发展，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儒学的声音。没有杜先生，我们本土没有一个儒学发出的声音。因为梁漱溟先生那时候已经不管这些事了。杜先生把海外、包括英语学界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所谓儒家人文主义的各个侧面这些东西带进来，作为当时文化热讨论里面的几大热点之一，使讨论更加多元化了，不仅仅都是反传统的，还多了一个传统的声音。这个声音从当时到90年代一直到现在，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刚才想讲的就是杜先生的功绩，并不是把新儒学、特别是牟宗三他们的东西带进来，扩大牟宗三的影响。我觉得他更多是把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和现代意义，和外部世界讨论的丰富性带进来，使我们的视野开阔多了。当然，不等于他当时讲了就有很多人同意，他讲的恰恰是很多人都反对的。年轻学者像杨念群、陈维德先生都写了文章。当然像李先生和朱先生他们。（朱维铮：我是自始至终反对的。李泽厚：我一直是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嘛。）当时李先生不方便写文章，可能是比较客气吧，因为杜先生刚来。

李泽厚：不，我不客气呀，我在海外华人里面反对的最激烈的就是杜维明先生了。85年的时候我和他在我家里就争论过。杜先生当时是比

较温柔敦厚、比较谦谦君子吧，我这人就比较干脆。我得罪了他，他倒没得罪我。很难得。我反对他那么久，他最近一篇文章还说我好话。

陈来：那个时候反对他的人其实观点是很多的，虽然他讲了这么多。

李泽厚：他是最早到大陆来的人文方面的学者，大家都有很大的新鲜感。而且承认他讲的话很重要。当时对他的学问的新鲜感，其实是被包括在当时对西方的那种向往、崇拜在内的。这一类的人是很多的，真正说反对他的人倒很少。当时是这种情况。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新鲜感还有一层，他不会误解成复古派。因为他是西方长大的，了解西方。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弘扬儒学。

李泽厚：但是当时的主流的确是反传统的。所以他当时没起什么影响。尽管当时他讲课的录音到处放，他很会讲演很会讲课。

陈来：当时的青年学生还是有相当的反响。我记得当时黄克剑也在《读书》写了文章，基本是对杜的观点的否定。当然更不用说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了。但我认为杜先生有一点是不错的，他始终是以非常开放的态度。这个你跟别的学问家打交道我觉得是不太容易（遇到）的。他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来和别人交换意见互相沟通。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你要碰到台湾其他的新儒家，恐怕就很难这样沟通了。另外，杜先生他本身虽然是新儒家，不同意五四的观点，但是他对五四有同情的了解。他当时有一个讲法，说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五四的继承人，而且他也经常批判所谓“封建遗毒”。这个方面我觉得他非常开放，不是纯粹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人。

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我也来回忆一下。我和杜维明打交道非常之早，特别是从1981年他第一次到上海，然后一直到90年代初，他在上海的所有活动都是我主持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同意过他的观点，不过我以为有一点好处，就是现在的几个所谓新儒家跑到上海都会来找我。成中英算不算我是不知道，我最听不懂他的话，我也最不佩服他的意见。刘述先跟我也很熟悉，但是刘述先是进攻性非常的强。我几次请他到上海开会，只要有一点不同意见，他就给你毫不客气地驳斥。不过我很欣赏他这个性格。不同意就争论，那也很好。杜维明，陈来刚才说85年他才讲第三期，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请他到上海去作报告的时候他已经在讲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当然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搞清楚。

当时大概是1983年第一次在复旦搞了一次中国文化座谈会，1986年我又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国际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我觉得即使假定杜维明他不是在国内首次提出来复兴儒学的人，我想他也是把原先大家的一些意见推到桌面上来地这样一个物。在这以前发表了一些关于儒学、孔子的文章，这当然都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但是在那种气氛之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气氛底下，就很难讲能够公开的谈论这些问题。我觉得至少从我的感觉来看，杜维明他讲到新儒学又讲到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刚才我很同意陈来的意见，他这个人有一点，我觉得他是开放性的，他比较能够听不同的意见。也不是像那样一种，像成中英，我总是给他弄得糊里糊涂的。他讲的东西，那一套分析哲学什么，我极端地不感兴趣。因为我是搞历史的，我这个人你给我讲什么太抽象的东西我就很讨厌。杜维明倒是一个比较大的功劳，他在80年代把我们国内关于儒学的讨论推向公开化。还有一个，他能够推向比较心平气和地争论，不是那种非常大的批判性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一直与他进行合作的原因之一。（李泽厚：我说今天这个会，不是来歌颂杜维明的。我们讲三期或几期发展都可以，这个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或者儒学这几十年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状况之中？）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所谓第三期不第三期，我是根本认为，从清朝末年以后就根本没有儒学。（李泽厚：对呀，这跟牟宗三先生的意见一样。）不是，他的意见是另外一回事。他要复兴，我以为它已经死了。（李泽厚：那时候反传统你也有份，不过你不在四大将之内。）不不不，四大将是北京人，我上海人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我现在也不来挑起什么京派、海派、其他派。我觉得我们北京现在有一点关在自己的圈圈里面在那里讲话，根本不太考虑外面的那些事情。最近我在看那些，最可笑的就是最近那个国际儒联，一个官僚机构，弄上几个退休的外交官在那个地方争夺几把破椅子。（牟钟鉴：没有外交官，那个外交官已经去世了。）李泽厚：我就看，原来我还算他们的理事，给我革掉了，现在叫做顾问。每一期都给我发所谓的简报。我一看到那个简报我就想到中央文件，那么一个屁大的组织，关起门来充大王，这个实在是那个。（李泽厚：那是统战工具，管它愚蠢不愚蠢，碰到了官僚机构，你完全可以对它同情地了解。）还有一个孔子基金会，当年匡亚明在的时候倒还做了一些事，到了匡亚明去世以后里面就抢，因为我以前也是所谓的理事，现

在是不是我不知道了。以前双方打官司都给我寄材料，所以最可笑的是北京的报纸上登的叫做《孔子告状》。也就因为这么一来以后，我想这两个组织这样一弄以后，基本上对我们大陆对儒学的学术讨论，依我看起负面作用。人家看儒学搞来搞去搞到这种程度了，谁来跟你讨论？我们在座的有一位还公开批判我说是我侮辱中华民族的圣人。我没有侮辱中华民族的圣人。我这个人被别人批我以后我总会自我检讨，检讨以后我发现如果这个批的不对的话，我就会记得很牢。（李泽厚：这是鲁迅传统，应该这样。）所以我说我现在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大家在那里讨论什么国学啊、什么儒学啊，一哄而起都在那里弄。起码你从历史上要说清楚一点。比如说，国学不是国货，是日货。第一个讲“国学”的是从日本人那边搞来的。“国粹”也不是国货，也是日货，也是从日本人那里搞来的。如果讲自己有一点发明，那就是章太炎讲的“国故”。（李泽厚：国学这个词本来就是个问题。所以钱穆当年他的《国学概论》里开头就说“国学”这个词能不能够成立。陈来：他说将来可能不能成立。李泽厚：他说将来可能不成立，因为他是20年代、30年代……）我想他应该了解，因为当时最早的时候，1901年，在讲“国学”的时候黄遵宪就指出来了，这个不是中国的东西，这是日本的东西。中国从来没有自己讲“国学”过。那么“国粹”呢？国粹开始讲的时候，也是黄遵宪已经讲过了，“国粹”不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日本的。那么我在想，我最近还讲了一下，当年吴汝伦1902年跑到日本去，一大群日本人怎么在那里跟他谈中国要不要搞国学呀中国要不要保存国粹呀，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些人都是混讲。最近我在上海做了一次演讲我就在那里问：你讲国学你讲的是哪一国？你讲的肯定不是现在的中国。因为在历史上只有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我们才讲到中国。从前的“国”，你比如说现在有人讲“宋学”，我老问他，你知道北宋只占中国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吗？你知道中国的南宋占中国的土地不过就是五分之一吗？那么其他的那些你都不算中国？你如果特别的强调国学，国学只是汉人之学，又只是儒学，又只是宋朝以后的一套东西，那么我想起来，你这跟陈水扁的“去中国化”相呼应。（李泽厚：这个帽子太大了。）不太大，一点都不大。我已经找出来了我们海内那些讲国学的、讲孔子的那些言论，什么时候我给它抛出来。（陈来：人民大学的国学院专门研究西夏什么的。牟钟鉴：文化中国，不是地理中国，不是经济中国，是文化中

国。)文化中国你包含不包含历史上其他的那些人?(牟钟鉴:应该包含,多元的。)那么好,所以又要讲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讲“新儒学”,我以为也要给它有一个定义。我以为杜维明他在推广新儒学,他的功劳是有的,但是他基本上是失败的。他没有把那一套东西成为大家真正很好地研究的一个对象。谈论的对象是有了,但是它不是一个研究的对象。这就是我想回应的一点。

黄万盛:因为后来我在燕京工作,跟杜先生接触的时间稍微多一些。所谓这个儒学第三期,的确是刚才李先生讲的,牟宗三提的问题。后来杜维明用这个儒学第三期的时候,他有一个另外的考虑。从熊十力、梁漱溟那个方向上来看,他基本上会认为熊十力和梁漱溟是第一代新儒家,所谓第三期中第一代的问题。第二代是牟宗三、唐君毅。第三代就是余英时呀、他(杜维明)呀,刘述先呀、成中英呀等等。余先生他写《钱穆与新儒家》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但我觉得他那个不承认当中有当时钱穆和牟宗三的余绪在里面。当然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看法有一些谱系在里面。杜先生为什么提这样一个“三代”?我觉得是把他的考虑提出来,看看可不可以有些讨论。他基本上认为熊梁这一代是要守住,因为在五四那个大潮当中全盘性的反传统。能够有这样一些人物把儒家的薪火传下来。到了60年代那个所谓文化宣言,事实上这个在港台的牟宗三等等他们跟熊梁的任务有一些不同。因为熊先生和梁先生的西学背景相对牟宗三先生等等稍微要弱一些。所谓牟先生是在西学泛滥的情况下面开始作出回应。杜先生认为他们这一代是完整的了解西方的学术,也能够真正在对话的意义上把儒家的资源重新彰显出来。所以他划这三代,这三代人的使命是完全不同的。杜先生他们这一代是可以把儒家的资源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文化经验来面对整个西方的学术力量。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李泽厚:看他有成果没有。)对,我想他划这个三代,就是梁牟一代,熊唐一代,然后他这一代,他这后面可能是有一个idea在里面。

陈来:儒学第三期,我们知道杜先生他有两个讲法。一个是顺着牟宗三讲的,就是从先秦、宋明到现代;一个就是从中国到东亚、到世界。第三期他有这样两种讲法。可是“新儒学”这个概念,我们讲到“新儒学”“新儒家”的时候,杜先生讲的还是在熊十力、牟宗三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这个线索下面的概念。所以杜先生新儒学的概念、新儒家的概

念，没有他儒学第三期的概念那么广。他还是比较重视熊十力、牟宗三的这个讲法。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李先生他也讲荀子呀、马克思呀等等，就是新儒学、新儒家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丰富的。所以我们事实（地）求是地看，如果你脱开香港或者台湾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儒学当代和未来的发展，这个儒学的发展一定是非常丰富的。绝对不可能是熊十力、牟宗三的一枝独秀。所以如果我们说新儒学在中国不仅受到研究，将来它本身也有所发展。这个发展一定是超越所谓心学的系统的，是非常丰富的。李先生当然也是一个方面了。你来讲讲你跟新儒学。

李泽厚：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我的讲法是“四期”。牟宗三杜维明他们说的儒学第三期可以作为儒学“第四期”的一个流派，也仅仅是一个流派。儒学第四期可以有很多流派。（牟钟鉴：“第四期”有没有文章出来？）我在99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说儒学四期》。……我多年都不参加这种活动，国内国外都这样，什么会我都不参加，也谢绝各种讲演之类的邀请。今天所以来呢？第一个是好久没有到这来了，想会会一些老朋友。不过今天很遗憾，没有看到几位老朋友今天我变成最老的了。还有呢就是听听大家的高见，因为我好久没有接触，对这方面都很生疏了。但是我一看到“儒学第三期”要我老，这是不是你们向我发的挑战书？你们都知道我是不赞同“儒学三期说”的。那我就来吧，因为不来人家可能就认为我认输了。这我是有经验的，我记得我20年前提“西体中用”，当时方克立先生带头搞了一场大批判。我几年没有讲话，五六年没有讲话。后来，我不写了个《再说“西体中用”》吗？这个文章可能大家没看过。但我认为从原则到细节，今天看还没什么错。所以当时有人说的很全面，像傅伟勋先生“中西互为体用”，还有周策纵说“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这个原话、原文，而且有的是标题。我说这是废话呀，你等于什么话也没说。还有十多年前我提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许多人不知道是我提的呢。这是很短的一个，刊发在《二十一世纪》。后来王元化就提出一个“有思想的学问，有学问的思想”。有很多人就说“啊，这才是真理，看这多全面啊”。李泽厚那个是“伪命题”。（朱维铮：你掉了一个字，他是讲“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你去掉那个“家”字就两样了。“家”是指个人，你去掉了那个“家”就等于……）我更正，“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

我也好几年没做解释，因为王元化先生对我挺好。但是，我认为“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也是废话，等于没说，恰恰把这个思想和学问的矛盾和问题给掩盖起来了。不论从现实来讲，或是从历史来讲，都是有差别的。顾炎武和黄宗羲，跟惠栋这些搞考据的大儒，还是有区别的。都是“有思想的学问家”或“有学问的思想家”，就跟“中西为体，中西为用”一样。我为什么讲这么远呢？就是为什么今天讲三期我必须讲几句话呢，因为我不承认这第三期的。三期说认为孔孟是第一期，宋儒是第二期，然后熊梁牟是第三期。我在《说儒学四期》里明确的针对杜维明先生，点了杜维明先生的名。因为杜维明先生说过，你分期分十期也可以。我想这不是一个分几期的问题，这是怎么样看待儒学的问题。我分四期，孔孟荀是第一期，他们的主要课题是礼乐。第二期是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是《汉书》里面给董仲舒下的定义，他的核心是天人。有人把他给撇开了，像劳思光，认为董仲舒不算儒家。《汉书》里说他是“儒者宗”，都尊他为宗了，怎么能撇开呢？如果讲阴阳、讲天人合一就是不对，那这个今天还在讲，影响之大并不下于宋儒。尽管阴阳并不一定是儒家本来的东西，但是拉进来做骨干，我觉得很了不起。这就是儒的气派汉儒绝对不能忽视。“新儒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去掉。宋儒作为第三期当然没有问题了，它的主题是心性。现在是第四期，第四期的主题是什么？这需要大家去寻找。我的看法是“情欲”，我认为这个主题应该是开放的。依据“三期”说，儒学就只是一种内圣之学，就是强调它的宗教性的方面。这方面我觉得牟宗三先生做了很多工夫，所以我对牟先生的工作是加以肯定的，认为做得比较深，超过前人。但是我在20年前的那篇文章，现在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讲现代新儒家的，那是比较早的文章，1987年出版的，我就说从理论上看恐怕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很难开拓起来。现在过了20年，我孤陋寡闻，很多书也没看，我就不知道这20年来新儒家还开出了什么重要的成果超过牟宗三的。我不知道，假使有人告诉我，我很愿意拜读。不过据我感觉似乎并没有什么。那就不幸言中。我这个话是20年前讲的，题目是《略论现代新儒家》。因此，我对这个“三代”说也表示怀疑。老实说，从整个体系上，我把现代新儒家界定为“现代宋明理学”。牟宗三讲得很清楚，熊十力讲得很清楚，继承的就是陆象山王阳明。冯友兰我也把他算一个，他继承程朱讲。牟宗三先生是